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晚清学术书系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 1815 至 1911 年
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晚清学术书系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晚清学术书系

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学
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邹振环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5 字数 380,000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5-2719-0

K·301 定价: 24.40 元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

——序《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

周振鹤

20世纪,由于语言学的发展,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导致了其他学科,例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等的转向,以至有linguistic turn(语言学引起的转向或语言学导向)这样的术语产生。这一术语生动地说明了语言学在本世纪一度出现过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地理学在今天显然不是先行的学科,对其他学科也没有产生像语言学那样的导向作用。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西方,地理学曾被看作是“科学之母”,许多学科都从其中分离出来;二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的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的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出现各种变革的观念,引起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思想革命历程。

早在明清之际,接踵而来的耶稣会士就给中国士大夫带

来了关于世界地理的最新知识。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等图书在传教士的著作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量。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我很怀疑,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某些人放弃旧有的信仰,而皈依基督教的营垒。虽然与耶稣会士接触的大部分士大夫保持了原有的信仰,但这种震撼显然让他们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先进性,进而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问题是出现这种变化的范围还很小,由于中国对传教所采取的严格限制,能够了解到西方地理学成就的中国知识精英并不多,至于一般人更是未受影响地保留原有的传统观念。对中国知识分子普遍产生影响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主要是在19世纪传播开来的。这个世纪无论对西方地理学还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17世纪末,在西方,自然科学的诸多学科都分别脱离自然哲学而另立门户。到了19世纪,各人文学科包括地理学(地理学兼有自然与人文两个领域)和历史学也同样自成体系。对于西方地理学而言,19世纪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一世纪不但是古典地理学与新地理学的交替时期,而且也是西方大学正式将地理学作为大学课程的开始,而对中国来说,19世纪意味着康乾盛世的全面过气,社会衰落腐败的征兆到处冒头,思想敏锐的精英们已在酝酿一种改革的思潮,这种思潮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更加强烈。而在这个当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再次叩击中国的大门,将基督教义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一起输入中国。这次进入中国的主要是新教传教士,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还只是在中国外围及

沿海地区施加影响,而在40年代以后则是偕枪炮俱来,公然而且正式,因此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大大超过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到了20世纪初,由于留日学生大量地理学译著的行世,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又出现另外一个高潮。

邹振环这本《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正是向我们展示了1815至1911年间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影响程度。也许就一般的认识而言,不大会感觉到地理学的传播于近代学术思想有若何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或许就可以说明这种作用的力度。1890年,梁启超说自己入京参加会试之后,归途经由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地理学直接影响下的产物,而此时去《志略》之出版已四十二年矣。换句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后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还不知五大洲为何物。那么一般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可想而知。而梁启超正是在知道了五大洲以后,才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凡百不如西方,如不维新即无出路。

世界地理知识在今天真是普通极了的东西,但在150年前却完全两样。中国因为闭关自守,从来只有天下的意识,并不知天下之外还有世界这个概念。所谓天下就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加上四夷的地域范围。鸦片战争爆发时,朝野上下都不知道敌手英吉利是何方土地,后来才晓得是七万里以外一个面积只相当于台湾、海南二岛的蕞尔小夷。这一来激起了一些思想先进的官员认识世界的强烈欲望,先是林则徐请人将西洋人所著的《地理大全》翻译为《四洲志》,但这本书从未刊刻过,一般人无由读到。后来林则徐又请当时的名士魏源,以此书为基础编辑《海国图志》,后来又有上面提到的徐继畲

《瀛环志略》问世。这两部经典式的世界地理著作的产生,表明了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基本思路:如果对西方的存在尚且不知,又从何了解其底细,以采取对策?

西方传教士也深刻理解到这种作用,所以在他们所办的中文杂志上,地理知识的传播是头等重要的内容。郭实腊在筹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就宣布了其宗旨。郭实腊编纂这样一份杂志,其目的十分明显,是要传西学入中国,表明西方文化是与东方文化并存于世的两大文化,而不是中国人所想象的蛮夷之俗。而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便是以此来开化中国人,使之不致影响到在华的外国人的利益。他在出刊前的一个多月就曾写过一份出刊缘起,明白无误地说:“虽然我们与他们(指中国人)长久交往,他们仍自称为天下诸民族之首尊,并视所有民族为蛮夷。如此妄自尊大,严重影响到广州的外国居民的利益,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本月刊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知道我们的技艺、科学和准则。它将不谈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可有较妙的方法表达,我们确实不是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但是要让中国人知道西方文化,首先就要让中国人懂得外国历史与地理。因此毫无例外,从1815年传教士所编辑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就以地理知识为主要内容。而这个杂志的创刊年份就是邹振环此书研究的时间起点,这是有标志意义的。

从学科性质方面说来,地理学恐怕是唯一的一门跨越自然与人文科学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有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 and 一整套专门的名词术语,这些知识与术语绝大多数都是中

国传统文化所不具备的,因此全面研究西方地理学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不可能在一本著作里得到圆满的解决。本书于是以地理学的译著为中心而展开,这样的角度显然使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传播的过程与影响的深度。但即使是以地理学译著为中心,也仍然面临着文献资料数量庞大,蒐集不易,整理费时等困难。尤其是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所做的是一种穷尽式的研究,几乎将一百年间的所有地理学译著一网打尽,其中大部分文献并非经典性著作,只是一般的笔记、文集,有些甚至只是用完即弃的教科书,存世极其稀少,至于某些译著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类,更是罕见之物,而全书即此一端,已可见作者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好在邹振环历来长于发掘史料,善于利用不被当成史料的文献,所以能见人所不能见,对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作出有坚实根据的论述与判断。

虽然本书是邹振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但与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该博士的处女作这一普遍情况不同,这篇论文并不是邹振环的第一本著作。在此之前,邹振环在出版史、翻译史方面的研究已经有相当丰厚的积累,除了数量颇丰的论文以外,还出版有《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与《江苏翻译出版史略》这样有份量的著作。由于有这样的基础,所以在攻读在职博士期间,尽管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依然能游刃有余地写下这部三十多万字,而且几乎是字字有来历的厚重的著作。读者可以从本书看到西方地理学知识在明清之际以及晚清是如何由微而著,由点滴而全面地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全过程,也同时看到这种传播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本来,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地理学一直是历史学的附庸,到了晚明,因为徐霞客和王士性的两大著作,即《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的行世,才使地理学脱离附庸地位而独立。这是中国自身学术发展而形成的必然结果。但在世界地理知识方面,中国当时仍然停留在天下四夷观的层面上,因此在明清之际与晚清时期,世界地理知识的引进,就似乎使历史与地理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靠西方地理来引路,才进而了解西方的历史,才走出天下而进入世界。当然西方地理学并不只有地理大发现以后产生的世界意识,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所说的地理学实际上囊括了今天所说的整个地学领域,自然地理学的全部内容以及地质学都包括在内,甚至连生物学也往往涵泳其中。而所有这些内容是西方近代科学的组成部分,除了个别先行者的个别著作外,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中都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两个时期地理学的传播情况变成是中西文化接触的重要与前沿的问题。因此从这一方面来看,本书所揭示的内容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题,而且具有学术史与思想史内涵的研究。

本书还有一章必须作为重点提出,这就是第四章“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这是以往同类著作中少见的发明。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制度名物以及意识观念的输入,有赖于新词语的创造,或者说,是以语言接触为前提的。许多中国学术史、科学史上所没有的新概念如何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一方面研究本身是另一个课题的范围,不能在这本书里解决,但极为难得的是邹振环花了很大力气,将自然地理方面的新词一个一个从文献中摘出,找出其最早出现的地方,以探索这些新概念到底在何时进入中国。这不

但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冒险的事,因为做学问的最大难处之一就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不能保证这些新词首次出现的地方绝对无误,但这样的工作显然为科学史与学术史做了极其有用的基础工作,是应该表彰的一种研究态度。现在,在国际学术界已有不少机构(主要是在大学)将中国近现代学术用语的形成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相信在本国,这一研究也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当然,我同时也相信邹振环此书的出版将会与他的其他著作,如《影响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一样,成为有关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籍,而且将会对学术史的发展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目 录

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周振鹤)	1
引言	1
一、地理知识与地理学——研究范围	1
二、边缘史的清晰度——资料与先行研究	3
三、知识传播与思想变革——方法及其意义	9
第一章 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与新知识点的引入.....	17
一、明末清初东传的主要地理学汉文西书	17
二、地理学汉文西书引入的新知识点	23
三、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的传人与中国士大夫的 “世界意识”	40
四、西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学术挑战与中国士大夫的 非学术应战	46
第二章 19世纪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译者绘制的 地理学知识线	61
一、风从南洋来——19世纪初南洋地区出版物传入的西方 地理学知识	64
二、郭实猎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71
三、裨治文与第一部中文版美国地志的编纂	79

四、裨理哲的《地球图说》与《地球说略》	85
五、慕维廉与《地理全志》	89
六、《遐迩贯珍》和《六合丛谈》中的地理学译著	104
七、傅兰雅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地理学译著	115
八、艾约瑟及其西学地理学的启蒙	124
九、19世纪中国“地理大发现”的文化意义	134

第三章 戊戌到辛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

的输入	158
一、留日学生运动的掀起与日文地理学西书的翻译	159
二、广智书局的地理学译著	168
三、商务印书馆的地理学译著及其影响	175
四、作新社、金粟斋、新学会社及其地理学译著	182
五、会文学社与《普通百科全书》中的地理学	192
六、学部编译图书局的世界区域地志译著	199
七、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与知识体系的输入及其影响	206

第四章 晚清地理学文献中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

一、晚清开始广泛受到重视的明末清初的地理学新词	234
二、19世纪汉译地理学文献中的地理学新词	235
三、20世纪初地理学新词中来自日本的译语	239
附表：《晚清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表》	242
附表：《晚清西方自然地理学新词表》	252

第五章 清末的地理学教育与近代地理学教科书

的编纂	266
一、教会学校中的地理学教育	267
二、清末近代学制的变迁和地理学教育体系的确立	273
三、清末民营出版社地理学教科书的编纂	282

四、清末乡土地理教科书的编纂与民族自尊自信意识 的重铸	295
第六章 清末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中国地理 学的学术转型	309
一、中国近代地理学确立的时间和标志	309
二、晚清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形成	312
三、以《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为中心的交流网络	316
四、邹代钧与清末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初建	322
五、张相文与中国地学会	330
六、中国地理学从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与近代地理学 的确立	336
附录一：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知见录	353
一、地理学通论与教科书	354
二、地球与地文学	366
三、气象与气候学	373
四、文化与政治地理学	376
五、区域地志	380
六、商业地理学	392
七、交通与旅游地理学	395
八、军事地理学	399
九、地图册与地图解说	403
附录二：晚清中国人编纂的地理学教科书书目	407
一、童蒙读物与小学教材	407
二、中学教材	413
三、师范专科教材	414

四、大学教材	415
五、参考图册类	416
附录三：晚清地理学译著与教科书出版年代分类	
统计表	417
附录四：引用文献	421
后记	441

引 言

一、地理知识与地理学——研究范围

地理知识是人类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包括地理名称、地理数据、地域分布、地理景观等各种地理事实的材料。地理知识是与人类的“空间知觉”同时产生的,^①随着文字的出现,地理知识形成了地理文献,地理文献的积累和增长,形成了最初的地理学。地理学是在地理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条理化的结果,如地理规律、地理成因等的推理和概括。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领域,它所研究的地理环境,是地球表面自然、技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系统。在地理学史的研究上,研究者考察地理知识和地理学的进展,往往从地理发现、地理文献、地理学思想三者入手,本文有关传播与影响的研究,是以晚清西方地理学译著的形成和流传为中心,以东传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与思想为线索。

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地域居住的不同民族,形成了他们各自对周围世界的不同看法。古代中国和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的地理认识。古代西方的地理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因为在古代科学分化不明显的时期,它是一个包罗广泛的领域。近代科学的发展,使许多同地理学相邻的学

科,如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相继独立,17到19世纪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经济学的进步,又为近代地理学向一门科学迈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16世纪的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也产生了飞跃的进步。地理知识与欧洲资本主义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是同步前进的。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出现了绘有美洲和南极大陆的新的世界地图,西方有关地球形状、海陆分布、气候差异以及各国地理情况的认识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新的地理认识通过文献的形式将所总结事实上升为理论与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学派。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在地理大发现这一背景下从欧洲来到中国,为中国人带来了地理大发现后形成的地理学汉文西书。^②虽然,本书是以1815至1911年引进的西方地理学译著为考察的中心,但从文化输入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追根溯源,利用学术界先行研究成果,简要地论述一下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点。

在近代科学中,地理学是一门内容庞杂的学科,直至19世纪形成的近代地理学,才逐渐摆脱古代地理学半科学、半文学的状态,开始吸收近代科学的成果,形成了自己学科的一套范式和工作模式。以洪堡和李特尔为代表,对地球表面各种现象进行条理化描述,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一般性解释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同一时期,西方地理学的知识线在19世纪初通过作为主译者的新教传教士再度东传,特别是20世纪初的十余年间,由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地理学译者群体的出现,以及大量民营出版机构介入地理学译著的出版发行,使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从传播内容与规模、传播方式与渠道上,还是影响的范围和深度上,都

大大超过了明末清初,为近代中国引进了一整套西方地理学知识体系和专业术语,初步建立了能提供在概念与方法上进行传授的地理学教育体系,形成了非体制化和体制化的地理学共同体的交流网络,经过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碰撞与交融,使中国地理学在晚清发生了传统到近代的学术转型。

二、边缘史的清晰度——资料与先行研究

本书所作的这一研究属于中国近代地理学史的范围,然而,由于着眼点在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因此又走到了中外地理学交流史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边缘。作为一项文化边缘史的研究,本书所依据的资料与先行成果相当驳杂与广泛,涉及了中国近代地理学史、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文献学等范围,这里笔者只能就相关的前行成果,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举要叙述。

最早注意西方地理学译著的是清末学者王锡祺,1877至1897年他分三次编成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选录了部分清代国内外译者译述的各种地学书籍。1894年同康庐辑印了130卷《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其中收入外国的地学图说多种。20世纪初的几本西学目录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如1896年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出了若干西方地志方面的译著,并在后附《读西学书法》一文中评价了当时出版的部分地理学译著。1899年徐维则的《东西学书录》的卷3“地学”和1904年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卷5“地理学”分别著录了多种地学译著。

较早对中外地理学交流史进行系统研究的是1911年陶